

《葡华辞典》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现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葡华辞典》是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史上最早、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本文首次全面公布了《葡华辞典》的档案散页,并依据这些散页确定《葡华辞典》的作者主要应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并对学界所讨论的《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的关系做了探讨。

关键词:罗明坚;利玛窦;《葡华辞典》;散页

罗明坚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①,有关他的研究,最为薄弱的是对《葡华辞典》的研究。《葡华辞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和西方语言对照的汉语学习辞典,是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最早一部辞典,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34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D'Elia, Pasquale)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Societatis Iesu,简称 ARSI)首次发现了《葡华辞典》,档案编号是:Jap. Sin. I, 198。之后学术界做了初步的研究^②,最重要的成果是2001年利玛窦进京400周年时澳门基金会联合学术界出版的《葡华辞典》,魏若望(John W. Witek, S.J.)撰序,杨福绵撰长篇小说《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葡华辞典》重新影印出版以及杨福绵的长篇学术论文,代表了近年来学术界对这部辞典研究的最新进展^③。

杨文侧重对《葡华辞典》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在语音学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但并未对《葡华辞典》文献中的散页展开研究。杨福绵认为“辞典之前和之后是利玛窦或罗明坚手书的语言学、神学或科学笔记,笔记的汉语行文出自他们的教师之手。这些笔记很可能是由罗明坚带到罗马,而且很久之后才和辞典手稿合并在一起。手稿的页码是由档案员后来加上去的,而且在编排上存在相当的任意性,有时文章之间甚至完全没有先后顺序。尽管大部分笔记与辞典无关,但是对于了解手稿的写作日期,以及了解与罗明坚和利玛窦传教活动有关的历史事件的日期,却具有重大意义”^④。本文试图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葡华辞典》的其余散页部分做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葡华辞典》整体结构和辞典外的散页文献内容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这份档案为 Jap. Sin. I, 198 号文献,文献名为《葡华辞典》,共有 189 页^⑤,其中第 32-156 页为《葡华辞典》正

收稿日期:2015-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116)

作者简介:张西平(1948-),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分别得到金国平、杨慧玲、麦克雷、王苏娜、孙双、李慧等多位学者的帮助,正是由于他们无私的帮助,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翻译,才使本文得以完成。在此,对以上学者表示感谢。

① 参见张西平以下涉及罗明坚的著作和论文:《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北京),2001年第2期;《16-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语言观》,《汉学研究通讯》(台北),2003年3月;《西方近代以来的汉语研究》,《文化》(澳门),2003年4月;《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中西文化的初识:北京与罗马》,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

② 杨福绵文中有误,说“手稿一共89张”,显然是打印错误。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的〈葡华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魏若望编:《葡华辞典》,第106页。

文,即《葡华辞典》本身有124页,其余文献65页。陈绪伦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和图书目录提要》一书第253页中列出了散页的标题^①,但并未对这65页文献进行系统研究^①。兹依文献自然顺序和内容对这65页文献做一简单分类和介绍,因篇幅有限,本文只排列了部分散页的图片。

这是《葡华辞典》的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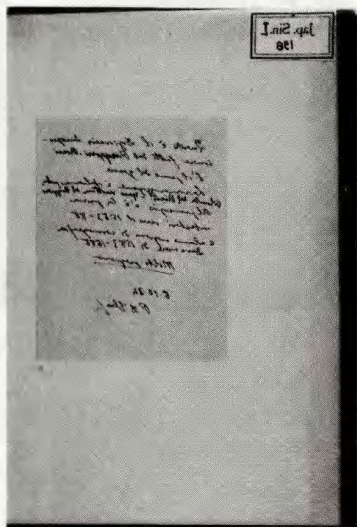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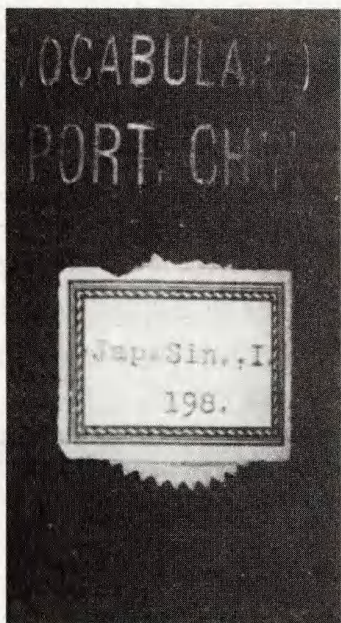


图1

Questo e' il dizionario europeo cinese fatto dal Ruggieri - Ricci (这是一部欧语中文辞典,是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做的),E' il primo del genere (是第一种这样的辞典),Lavoro maggior parte e' italiano probabilmente del Ricci(大部分是意大利文,大概是利玛窦所写),Spesso scrittura del Ruggieri(经常有罗明坚写法),Al principio c'e' la prima catechesi verso il 1583-88(开始也有天主教教理内容,大概在1583-1588年),E alcune nozioni di cosmografia (也有一些关于宇宙学的数据),Deve essere di 1583-1588 (大概1583-1588年),Molto prezioso (很宝贵的),6.10.34(1934年10月6日),P. D'Elia^②

第001页:记有个别单词和数字的散页。

第003—007页(见图2):一份用罗马注音写成的对话录,完全由罗明坚手写。文献标题是“Pin ciù ven tà ssìgnì”,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将其翻译成《平常问答词意》,杨福绵认为德礼贤将“Pin”翻译成“平”不对,他根据辞典中的相同注音,认为应该翻译成“宾”,这样题目就是“宾客问答词意”。这份文献国内学术界也常有混淆,将《葡华辞典》和《宾客问答词意》混为一谈^③。这篇文献的写作时间,根据对话中“师傅来此几时?答:仅两年”之记载,罗明坚和利玛窦是1583年9月10日前往肇庆的,照此推算,这个对话应在1583年10月后^③。



图2:第003-007页

内容如下:

第008—0012页:空白页。

① 笔者《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一书对其中部分文献做过探讨,参见该书第45-54页。
 ② 在这里,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将拉丁文转写出来并翻译成中文。
 ③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华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北京),1995年第5期,第35-81页。参见古屋昭弘:《〈宾主问答释疑〉の音系》,刘丽川译,《中国语学研究(开篇)》(日本)总第6辑,1988年。

第 012v—16v 页:《解释圣水除前罪》(图略^①),是罗明坚对天主教教义的简单介绍。文献开篇说:“人欲进天主之教门者,则请教门之僧代诵经文,以其天主圣水而与之净首。既得天主圣水,则前日之罪恶尽弃,方识其天主而升天庭矣。”这篇文献对研究天主教历史和神学词汇有很高价值。如文中说:“僧自天竺国,心慕华教,不远万里,航海三年,前到广东肇庆府,蒙督抚军门郭俯赐柔远,施地一所,创建一寺,名曰仙花。请师教习儒书。”这样我们判断这篇文献可能写于 1586 年^②。这篇文献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文献,文献中天主教人名的中文译名都在变化之中,这对我们研究天主教翻译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③。

第 017v—23v 页(图略):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完全的散页,文献没有标题,没有连续性。文中提到整个天体的各个星座和每个星座内的数量,文中说“此球西竺儒者作上有四十八宿,每宿有人物像”,又说“地球在九重天中间又如心一般其体不动”。此文献虽然只有 8 页,但很可能是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次介绍,在天文学上很有价值。同时,由于此时罗明坚已经学习了中文,开始将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例如二十四节气等放入西方天文学中加以解释,以便中国儒生理解。因此,这篇文献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第 024 页(图略):中国二十四节气表,每个汉字有罗马注音。显然这是罗明坚用来学习汉语的基础性材料,通过注音形式来联系发音。

第 24v—26 页(图略):汉字表,共有 348 个字。估计这些汉字表是当年罗明坚的老师用来教授他们汉语所用。为何是这些汉字呢?有些汉字表示汉语的声母,有些表示韵母。“表示声母的汉字共有 339 个,其中许多汉字表示同一个声母。表示韵母的汉字不超过 39 个。”全

部共有 348 个字。杨福绵认为“这个字表中的声母和韵母与《中原音韵》中的完全一致”^④,这说明罗明坚他们学习的是官话。

第 27 页:中国地名以及语言学习词汇。(图略)

第 27v—28 页:中国节气词汇和天干地支词汇。(图略)

第 28v—29 页是一个汉语官话中使用的量词表,共收入量词 49 个,如个、本、条、把、副、行、盏等。(图略)

第 29 页是一个双音节同义词表。(图略)

第 30v—31v 页是双音节反义词表。(图略)

第 32—156 页为《葡华辞典》正文。(图略)

初步统计,《葡华辞典》共收入 6000 个葡语词条,其中只有 5461 个词条有汉语对应词,仍有一些葡语词汇尚未有对应的汉语词汇。

第 157—169 页是《葡华辞典》后的双语散页,内有中文和西文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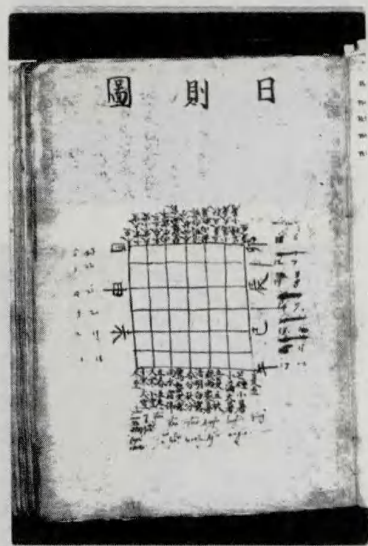


图 3:日则图

第 170—171v 页:日则图^④(如图 3)。但排列有问题,由于文献管理者不懂中文,将散页序

① 编者注:文中所有标记图略的地方,原文作者都放了散页的扫描件,因版面限制,图片被编者略去,有需要或感兴趣的读者可与编辑部联系获取。

② 文献的原字迹应是中国儒生帮助所写,陈绪伦认为这几页是从罗明坚的拉丁文教义问答翻译而来,从散页内容来看,不太符合。

③ 参见张西平:《〈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这几页散页仍需做深入研究,这里不展开。

④ 中国学者石云里在阅读这份文献后,认为《日则图》文献少了一页。我认为,由于这是一份散页文献,缺页是很可能出现的,目前陈神父的文献序号排列在内容先后顺序上和我复制的文献有一定区别,但在文献总序号上是一致的,都是 189v。这说明,在陈神父阅读《日则图》时并未发现这份文献缺页。目前作者正联系补上这张缺页,在这里感谢石云里教授给出的意见。

号排反了,阅读时,应从171v开始阅读,到170页结束。

第172—182页是罗明坚编辑辞典的散页,每页上都有数量不等的中文词汇和西文词汇。

第183、187、187v页(图略)是关于教徒蔡一龙操纵罗洪诬陷罗明坚,罗明坚告上法庭后,法庭的裁决书抄本^①。

第188、189、189v页:罗明坚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散页。



图4

第188页(见图4)有如下词语:人门,时人,偷闲,少年,野僧,渔郎。下面是拉丁文的祈祷文:

De profundis et requiem aeternam / a porta inferi

Erue Domine animas eorum requiescant in pace Amen

Domine exaudi orationem meam / et clamor meus ad te veniat

Dominus vobiscum

① 在《葡华辞典》的文件编号上,我所复制的电子版和陈绪伦的序号有些不同,他在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中说这份文献是186v—187v,但我从耶稣会档案馆复制的文献是183、187、187v 三页,从序号上我复制的文献缺少184—186三页,陈神父的序号中184—185属于《日则决》文献,这是我们两人在这份文献上的编号不同,但就这份文献内容来说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估计,由于这是一份散页文献,陈神父当年工作后,仍有不少学者借阅,我复制这份文献在陈神父之后,这样在排序上会发生问题。

② 英文可以翻译为:“de profundis” and eternal rest from the power of hell; O Lord free their soul and may they rest in peace; O Lord listen to my prayer and my cry come to you; The Lord be with you; And with your spirit. 这里感谢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将拉丁文转写出来并译成英文。

③ 利玛窦在自己的书中说:“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收藏。”这是利玛窦所谈自己学习汉语的唯一记载,完全没有提到他和罗明坚共同编写辞典。传教士在进行中文写作和学习时,有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即他们从来不提他们的汉语老师,从来不提他们中文著作的润笔者。

Et cum spiritu tuo

Oremus

Fidelium Deus omnium conditor, et redemptor, animabus famulorum, famularumque tuarum remissionem cunctorum tribue peccatorum: ut indulgentiam, quam semper optaverunt, piis supplicationibus consequantur. Qui vivis et regnas

这是罗明坚用拉丁文所写的祈祷书^②。

第189页有一个拉丁语人名的中文翻译“德阿多尼阿”(teotonio),杨福绵认为“这是St. Theotonius,意大利人 Teotonio (1086—1166)的汉语译名。此公乃正教公理科英布拉圣十字教团创始人,后来 S. Antonio de Padua 也加入此教团”^③。

二、关于《葡华辞典》的作者

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在谈及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作品时,均未提到这部书^④。利玛窦自己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谈到罗明坚时,从未提到过这本书;谈到他和罗明坚共同学习汉语时,也从未提到他们两人合作编辑了这部辞典^⑤。

在一系列书信中罗明坚并未提到自己编写辞典的计划^⑥,同样,利玛窦在一系列书信中也未曾提到过自己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编制辞典一事^⑦。

对中国天主教史做过深入研究的裴化行(H. Bernard)在其著名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 siecle)一书中,从未提到罗明坚和利玛窦编辑《葡华辞典》一事^⑧。

将《葡华辞典》作者归于利玛窦一人之观点,肯定是邓恩(Geroge H. Dunne)提出来的。

他在《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士》(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Ming Dynasty)中说：“这是一本由利玛窦在肇庆生活期间所编撰的《中葡词汇表》。这份词汇表有9页，这是他为帮助自己记忆用而写的。”^①

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首次发现这份文献时，使用“罗明坚-利玛窦”这样的作者署名方式。其在《利氏史料》中首次公布了这份文献(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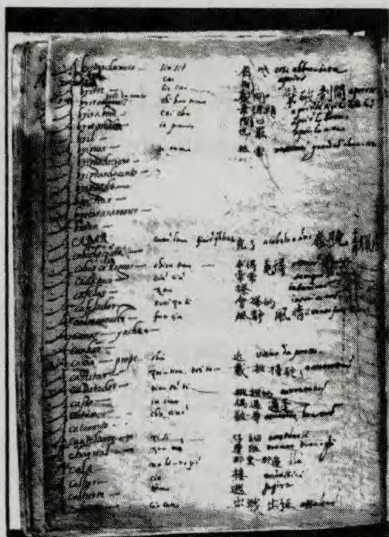


图5

在解释《葡华辞典》这一页时，他说：“辞典每页纸都有三竖行：一竖行是葡萄牙词条，按照字母排列从 abitar 到 zunir。这一竖行可能是一个抄写员抄写的。另一竖行是意大利文字母，感觉应该是利玛窦写的，没有声调和语调的标注。第三竖行是中文，其中一部分是两位耶稣会士中的一个写的。在最初几页 (ff.32-35b) 的一部分中，和 f.34a 第四竖行，是意大利文条目，应该是罗明坚写的。在两个附录中还

有几个附加的条目 (ff.157a-169-172-186a)。辞典没有完成，因为不是所有葡萄牙文词条都配上了中文释义。结尾有这样的文字，可能是罗明坚写的：Laus Deo Virginique Matri. Divis Gervasio et Protasio. Amen. Jesus.”^②

德礼贤的这段论述很含糊，在谈到意大利字母时，他说“另一竖行是意大利文字母，感觉应该是利玛窦写的，没有声调和语调的标注”。他这里用了“感觉应该是利玛窦写的”(a quanto sembra, dal Ricci)，这说明他并不确定。而谈到罗明坚时，却说“有第四竖行，是意大利文条目，应该是罗明坚写的”，这里说得较肯定。他认为辞典中的中文是“第三竖行是中文，其中一部分是两位耶稣会士中的一个写的”，笔者认为整部辞典的中文，很可能是一位文人帮传教士们所写，而不可能是罗明坚或者利玛窦。

德礼贤之后，这部辞典的作者问题似乎成了定论，即是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杨福绵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更是明确了这一点，他大体是在重复德礼贤的观点，但已经和德礼贤有了区别，他认为罗明坚在这部辞典中的作用是主要的，利玛窦是次要的。他说：“根据手稿的纸张、笔迹以及内容，我们可以证明这部《辞典》的主编者是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合编者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 S. J., 1552-1610)。编纂年代当是罗、利二氏初入中国广东肇庆传教的时期。他们两人于 1583 年秋天抵达肇庆，而罗氏则于 1588 年冬离开中国返回罗马。因此这部书稿当在 1584-1588 年间完成，也可能是罗氏亲自带回罗马去的。除了笔迹以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辞典》前的附页，得到更确切的结论。”^③中国学者近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部辞典^④。

① 邓恩 (George H. Dunne):《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6 页。这个说法太有问题，在中文翻译上也不妥，“一本”和“一份”在中文的量词上是很不同的，邓恩这里究竟说的是那种文献呢？从未见到利玛窦本人有独立的一本《中葡词汇表》，根据邓恩所提供的注释，他说自己的这份文献来自 1935 年罗马出版的德礼贤的 *Civiltà Cattolica* anno 86, II 第 75 页。

② 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e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i e commentati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I, Vol. 2, p.35. 感谢金国平先生提供《利氏史料》电子版，感谢王苏娜提供《利氏史料》纸版，以上是王苏娜帮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③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这是仅有的几部提到《葡华辞典》的中文著作，但仍是杨福绵的观点。

笔者认为,《葡华辞典》应是罗明坚所编。理由如下:

第一,《葡华辞典》中关于罗明坚官司的散页可以证明这一点。

上面所列散页的第183、187、187v三页,是关于教徒蔡一龙操纵罗洪诬陷罗明坚,罗明坚告上法庭后,法庭的判决书。德礼贤所整理的《利氏史料》(Fonti Ricciane)是这样记载的^①:德礼贤在整理利玛窦原稿时,在《葡华辞典》手稿中发现了关于罗明坚官司的散页,这样他在《利氏史料》第242页的注释6中,介绍了《葡华辞典》的这份文献,以加深对利玛窦记载此事的理解。德礼贤在242页注释6中写道:“我1934年在耶稣会(Compagnia di Gesu')罗马档案馆找到了它(Jap. Sin., I, 198, p. 187a-b)第418页下

注释2。根据这份珍贵的档案,蔡一龙(Martino)向陆于充借了8个银锭,1587年10月26日从番僧(罗明坚)那里骗来了一个三棱镜,之后就去了广东了。陆于充追了过去,他从蔡一龙那儿拿了三棱镜,交给岭西道,让他还给番僧,并把蔡一龙投进了肇庆的监狱以作惩罚。有个叫罗洪的诬告罗明坚与自己住在南门的妻子有染,为了把事情闹大,他还在墙上贴了蔡一龙写的状子,并且到官府匿名告发。但是李主湾证明罗洪已经和他的妻子分开了,而且罗明坚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罗明坚显然不可能操着外国口音,穿着外国服饰,走在从天主教堂到南门这么长一段路上去犯下那样的罪行而不被发现,何况(状子上说)事情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罗洪不愿意上公堂,诬告显然是蔡一龙设计的,因此

① 由于这个事件十分重要,为便于学术界更好地了解,我请孙双将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利氏史料》中相关内容翻译出来,供学术界参考。以下是孙双的译文:

在肇庆的天主教徒中有两个人,他们是父子,因热衷炼金术而耗尽家产,也没有挣到一分钱。他们问教徒马丁(Martino)神父们懂不懂炼金术,马丁说神父们懂,并且许诺把这门技术传授给他,条件是他不能告诉别人。那两个可怜的教徒相信了他,并且千方百计讨好他。马丁很穷,他们就给他换上新衣服,把他接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款待他,还花钱给他买了个老婆,觉得这样就能要求他把秘方说出来。马丁很痛快地答应了,要求他们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位神父。

马丁每天都到神父的家里去,就这样把说出秘方这个约定拖了三四个月,最后,他实在没法再跟款待他的人拖时间长了,就编了个日子,说那天神父会把秘方传授给他,他也就教他们了。与此同时,他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因为三棱镜在阳光下呈现出好几种颜色,马丁就以为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石,那天他向神父借出了三棱镜,说要给家里的某些亲戚看看。之后他就带着三棱镜逃回他自己的家乡(la sua terra)。

两个天主教徒知道了这件事后,马上跑到神父家哭诉,揭发骗子的骗局,告诉神父他们花了很多钱,一部分直接借给了马丁,一部分给他买了很多东西,向神父寻求建议。罗明坚(P. Ruggerio)去了两趟省会,终于得知马丁在那里,而且身上有三棱镜。那两名教徒中的一人在岭西道府上任职,他伪造了一份公文,上面写着岭西道下令抓捕马丁并投入大牢。带着这份公文他来到那个大都市,威逼马丁把三棱镜交给他,心想神父们见价值连城的宝石失而复得,一定会把他花在马丁身上的钱还给他。

有一天,长官(governatore)来到神父家里,如同往常一样,他带着其他要员来观赏我们的东西,这是城里最棒的参观和娱乐活动。当他要看三棱镜的时候,得知它被人偷走了。因此他立刻下了一道公文,下令抓捕马丁并带上公堂。神父们不愿意他这么做,说三棱镜并不是值钱的东西,不必费力找回它。长官说三棱镜不是神父们的,而是城中官员们的,他们常来观赏,所以他想把它找回来。

负责这件事的人里有个马丁的同乡,他立刻找到了罪犯的哥哥,对他说如果不把兄弟交到自己手上,就让他赔那颗珍贵的宝石,而且即使他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出于害怕,马丁的哥哥把他交了出来,马丁并被带往肇庆。马丁被捕后非但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丝毫忏悔,反而恶上加恶,和同牢房的另外几个靠欺诈维生的狐朋狗友商量好,在城中的角落散发传单,污蔑罗明坚与一名妇女偷情。

之后不久,那妇女的丈夫就出现了,他写了状子给岭西道,上面说他出城办事,回来时看到城中角落的传单,他回到家打了自己的老婆,那婆娘承认事是真的。因此他请长官严厉惩罚神父,并要求他赔偿。岭西道把官司交给城市长官负责,城市长官开始调查,并且查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对神父来说,为自己辩解非常容易,因为状子上指控他与妇女偷情的那一天,他正在广西省,距离肇庆需要走两个月的路。告状者是一个身份卑微、处于底层、非常贫穷的人,他既不占理,又无财无势,只想从神父们那里要点儿钱,而且只要一点点就能满足。但神父们一分钱也不愿意给他,因此他只能污蔑他们,对神父说只要他们给钱,他就能闭嘴。那个穷人害怕自己对别人做的坏事反而会害了自己,就带着老婆逃跑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因而在第二次开堂传讯他时,他住的地方已经人去屋空。

就这样,神父们恢复了自己在当地的名誉。长官很清楚,马丁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他把马丁传上公堂,宣判神父无罪释放,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马丁策划的,并且马丁还偷了三棱镜。

为此,长官当着神父的面令人狠狠打了马丁二十杖,这使他走路一瘸一拐,又判他入狱,以及罚款。他把判决书递交岭西道,请他批准确认,岭西道在自己府上打了马丁六十杖。送回监狱时,马丁已经众叛亲离,神父们一两个月给他一些施舍供他生活,直到他死于伤口以及狱中的其他折磨,他的恶行就这样得到了报应。那个得到了三棱镜的教徒得知马丁被捕,害怕官府会在他家找到赃物,就主动把它还给了神父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提。这样,神父们了结了这桩恼人的小事。

应该判他有罪,并让他把8锭银归还陆于充。”^[1]

本人在《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一文中做了初步的分析:“这段手稿所记载的就是利玛窦在《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2卷第10章“孟三德返澳门,罗明坚遭诬告”中所讲之事。手稿中的‘蔡一龙’就是利玛窦所说的‘玛尔定’。这段文字使我们更可确信这组手稿作者是罗明坚,而且我认为这段中文手迹很可能是罗明坚亲笔所写,因文中缺字、错字颇多,不像中国文人所写。进而推测《葡华辞典》也主要是罗明坚所编,利玛窦只是作为助手出现的,《葡华辞典》中的中文语词部分可能也是罗明坚亲自所撰,而不是中国文人代笔。”^[2]近期宋黎明在《神父的新衣: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一书中介绍了这份文献,夏伯嘉在《紫禁城里的耶稣会》一书中谈到这份文献,但在理解上有不少错误,这样在译成英文时就出了错。

近期宋黎明发表文章,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将这份文献全面整理,抄录如下:

审得蔡一龙于九月二十五日哄骗番僧宝石到省,意图重价勒索,且因借陆于充本良(银)八两,欲将宝石私当低(抵)偿。随充往省寻见,问论前情,是充执回宝石,送道验明,发还本僧。比一龙解到本府,暂收仓监,唤僧面质究愆。乃捏罗洪告词,称僧明坚与妻通奸,即指一龙写帖张挂瞒准(住?),后虑本府审出真情,又诉匿名诈害。今李主簿回称,罗洪原案住南门,与妻先期逃躲,即是一龙供报。详看罗洪与明坚素无来往,何故将妻自污、告害番僧?况南门去本寺颇远,以异言异服之僧,欲往通奸,一路地方邻佑,岂不窥见?即使潜踪,亦难逃于近处耳目;此奸棍甚多,脱一瞰如,登时捉获,或送官,或吓诈,仍所不遂,而始待久出之夫告鸣耶?此俚(理)之所必无,可知矣。今洪既不出官对俚(理),即一龙捏名妄告,图泄私忿无疑。应将一龙问罪,乃追还陆于充本良(银)八两,将一龙取问罪犯。^[3]

这份文献涉及到罗明坚,通过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英文翻译成中文版)和《利氏史料》中原有的意大利文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英译本的中文翻译,还是意大利文的原版整理都可以说明确有此事。而这份文献则从原始文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如果仅有这份文献还属于孤证,现在利玛窦的外文著作和这份文

献互证,说明此事的真实性。而这份证词现存在《葡华辞典》的散页之中,说明这是罗明坚返回欧洲所带回的,这份散页文献有力地证明了《葡华辞典》的作者就是罗明坚,即便利玛窦做了一些工作,也是微乎其微的。

杨福绵认为:“辞典之前和之后是利玛窦或罗明坚手书的语言学、神学或科学笔记,笔记的汉语行文出自他们的教师之手。这些笔记很可能是由罗明坚带到罗马,而且很久之后才和辞典手稿合并在一起。手稿的页码是由档案员后来加上去的,而且在编排上存在相当的任意性,有时文章之间甚至完全没有先后顺序。尽管大部分笔记与辞典无关,但是对于了解手稿的写作日期,以及了解与罗明坚和利玛窦传教活动有关的历史事件的日期,却具有重大意义。”^[4]杨福绵这段话说明,这些手稿和散页不可能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共同所有,他使用了“是利玛窦或罗明坚”之说法,这样的看法和他将《葡华辞典》看成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合著的”之观点,有重大区别。同时,杨福绵也认为,这批文献是罗明坚带回罗马的。这说明,这批散页只能是一个人所为,而不是两人合作的结果。通过罗明坚官司的散页文献,现在我们证明这批散页应是罗明坚所为,从而也间接证明《葡华辞典》是罗明坚的作品。

当然,这只是从档案编号是 Jap. Sin., I, 198 即文献的整体存放来论证的,即这是一批放在一个编号中的文献,我们证明了其中的一份散页是罗明坚所有,就可以间接证明这批文献的整体是罗明坚所有。这个证明思路还可以得到另一个佐证。

第二,《葡华辞典》中关于学习中国诗词的散页可以证明这一点。

《葡华辞典》188、189、189v 三页是散页作者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笔记散页,包括:“时人,人门,偷闲,少年,野僧,渔郎”(第188页);“德阿朵尼阿”(第189页);“地门,水绿,长安,冢上,池边,清溪,遥山,山光,青山,碧园,水光,源头活水来,源白,水远,绿遍,山山长,插田,山头,长沙,暮田,丘”(第189v页)。恰恰是这些散页的诗句,提供了它和罗明坚之间的关系。耶稣会档案馆 Jap. Sin., II, 159 号文献就是罗明坚所写的诗歌^[5],陈绪伦神父将这些诗歌

首次在西方期刊上公布发表^①。罗明坚这些诗中,有两首明显是和这三张散页有着联系的。例如第十首《寓广西白水围写京》:

绿水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飞。

茅檐瓦房清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

这里用了189v散页中的“青山”和“清溪”。第十一首《偶怀》:

朝读四书暮诗篇,优游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里用了188号散页的“时人”和“偷闲”。

而第十六首《天主生旦十二首》中其四:

天地星辰妇对夫,风云雷雨兔对鸟。

东西南北春对夏,天主灵通对却无。

这首诗采用中国文字中的双音节反义词,同时也是古代诗人在练习写作诗词时,作为对仗的基础性词汇训练,例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而在散页第29、30v—31v中,可以发现这里的词汇在罗明坚第十六首诗的“其四”中使用,例如,第29页的“东西南北”、“春夏秋冬”,第31页的“天地”、“日月”、“风云”、“雷雨”。

这些可以再次证明《葡华辞典》中的这些散页和罗明坚的关系,说明这些散页是罗明坚带回欧洲的。同时,由于这些散页是和《葡华辞典》作为一个完整档案存放在耶稣会档案馆,这样可以间接证明《葡华辞典》是罗明坚所作。

第三,《解释圣水除前罪》散页与罗明坚的关系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015v—016页共8页,是罗明坚写的一篇介绍天主教的短文,无标题,但对了解这批文献和罗明坚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他在散页中说:“中华大邦与本国辽绝,素不相通,故不知天主,不见经文。僧自天竺国,心慕华教,不远万里,航海三年,前到广东肇庆府,蒙督抚军门郭俯赐柔远,施地一所,创建一寺,名曰仙花,请师教习儒书。幸承仕宦诸公往来教益,第审之不识天主并其经文。僧敬将经本译成华语,兼撰《实录》奉览。”这里的《实录》就是他所

写的《圣教天主实录》^②。罗明坚1584年在一次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编天主实录》,是用中文撰写的,用了四年功夫,曾呈现给中国官吏批阅,他们曾予我褒奖,要我赶紧印刷,越快越好。”^③这应是对这些散页和《葡华辞典》属于罗明坚的最直接的证明^④。

另外,从对这批散页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这些散页并非和《葡华辞典》无关,其中部分散页的内容已经被收录到辞典中,如散页文献27页中关于中文日期的说法“大前日、前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大后日、去年”,这些全部被收录到辞典之中,说明这些散页是罗明坚编辑《葡华辞典》时的一些准备材料^④。

以上材料可以初步确定《葡华辞典》是罗明坚所编,利玛窦即使参与了部分工作,也是微乎其微的。从常识来讲,如果这部辞典属于利玛窦和罗明坚共同所有,罗明坚是不能将手稿带回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辞典乃原始手稿,在中国并未发现任何这部辞典的抄本。

罗明坚在来华耶稣会中历史地位的评价,需要重新考虑,我在文章和书中都对这个问题表达了看法。近期学术界也有这样的看法,宋黎明在讨论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水平时,认为当年范礼安遣返罗明坚回欧洲的两个基本理由都是站不住的,利玛窦晚年对罗明坚汉语水平的贬低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宋黎明在文章中已经问到这些问题:“无论如何,罗明坚的汉语口语绝对好于孟三德,更好于麦安东;孟三德和麦安东继续呆在中国,罗明坚更有理由留下。既然范礼安列举的两个理由均不能成立,那么他遣返罗明坚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利玛窦如此贬低罗明坚,又出于什么动机?”^⑤显然,这些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关于《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的讨论

与利玛窦相关的语言学辞典有两部,一部

①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41), 1993, pp. 129-176. 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第59-66页。

② 1583年第一次出版时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③ “罗明坚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罗渔译:《利玛窦全集》第4卷《利玛窦书信集》(下),第456页。

④ 下一步笔者将研究关于这批散页和《葡华辞典》在注音上的异同,并通过对注音系统的研究说明散页和辞典的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葡华辞典》，一部就是他第一次进北京失败后，从北京返南京途中，与钟鸣仁(Jean Fernandez, 1581-1620)和郭居静(Lazre Cattaneo, 1560-1640)一起所编的《汉葡辞典》。

关于后一部《汉葡辞典》，利玛窦晚年曾回忆到：“整整用了一个月的功夫才到达临清。这看来似乎是浪费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但实际上却不是。钟鸣任擅长使用中国语言，由于他的可贵帮助，神父们利用这个时间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他们还编成另外几套字词表，我们的教士们学习语言时从中学到了大量汉字。在观察中他们注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会产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有声韵，谈话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各种意义，因为他们共有五声。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诗歌有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士所创造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如果是随意书写而没有这种指导，就会产生混乱，而对阅读它的人来说，书写就没有意义了。”^①

杨福绵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德礼贤将《葡华辞典》和后来利玛窦等人编辑的《汉葡辞典》混淆了，误将后者作为前者。在《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一文中，杨福绵在解释了利玛窦等人编撰的《汉葡辞典》后，

写道：“德礼贤认为这部辞典就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编撰的那部辞典，他在1935年写道：‘我还发现了第一部由欧洲编撰的欧洲语言—汉语辞典。这是第一部汉学著作，由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兄弟般的合作完成。它肯定就是基尔舍(Kircher)1667年提到的那部辞典。基尔舍当时这样写道：至于我们(耶稣会士)使用的汉语辞典，我这里有一副本，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我愿意出版这个副本。’”^②杨福绵对德礼贤的这个批评是有待商榷的，他在《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一文中所引德礼贤的话是在他1935年的文章中写的^③。

这篇文章笔者没有读到，或许德礼贤1935年的文章曾将《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搞混，但在1942年出版《利氏史料》时，德礼贤在整理转写利玛窦第一次从北京返回南京，在运河上路经临清时编撰《汉葡辞典》的文字，在注释中说：“事实上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的最初几年(1589年前，很有可能是在1584-1588)就已经写作了一本不错的字典。1598年10月18日，龙华民称‘利玛窦做了这本欧汉字典的相当一部分’。这部汉学古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欧汉字典，我们可以给这本字典这样一个名称——葡华字典。这部字典的手稿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Jap. Sin., I, 198。我本人于1934年找到并证实了这部文献。这部字典用的是中国纸，尺寸为23乘16.5。”^③这里很清楚，德礼贤明确知道这是两部辞典，而且完全不一样，并且在《利氏史料》的第33页复制出了《葡华辞典》的一页。德礼贤在这里是清楚的，他并未混淆这两部辞典。只不过在这里个别语句的语言表达上容易引起歧义。例如，德

① 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魏若望(John W. Witek)编：《葡华辞典》，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葡萄牙东方学会、美国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2001年。杨福绵在文中说：“德礼贤以为利氏上面所述的字典就是《葡汉辞典》。他说：‘我也找到了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汉字典。这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第一部汉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这便是季尔赫尔(Athanasius Kircher, 又名基歇尔)在1667年所提到的’，他说：‘我有一部为我们(耶稣会传教士)使用的汉语词典手稿，如能获得印刷费，我很想把它付印成书。’但是事实上恐怕并非如此。……这部字典为 Vocabulario Sinicoeuropeo《汉欧字汇》或《汉欧字典》。上述季尔赫尔称它为《汉语字典》，而且是可以付梓的定稿，就是说，其中罗马字系统声调及送气音符号都已定型。这一切都表示这部字典的原语是汉语，是一部《汉欧(葡)字典》，它与《葡汉辞典》并非一书。”

②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华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排印有误，说德礼贤是在1935年写的文章，但在他的注释参考文献没有注出1935年的文章，而是注出了1938年的一本书。同时在正文中他将德礼贤的这篇文章出处标成“德礼贤1983b:695”，这实际上是杨福绵自己在后面注释中所指德礼贤在1938年所写的书，即 Atti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Roma, 1938, pp.693-698, 杨福绵将1938误写成1983了。

③ 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e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i e commentati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I, Vol. 2, p.32.

礼贤在注释中所说的“1598年10月18日,龙华民称‘利玛窦做了这本欧汉字典的相当一部分’”这句话有些模糊,因为1598年正是利玛窦第一次从北京返回南京时,这样龙华民这句话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汉葡辞典》。而《葡华辞典》,龙华民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德礼贤将龙华民这句话放在这里容易产生模糊。当然,德礼贤在注释的最后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给这本字典这样一个名称——葡华字典。这部字典的手稿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Jap. Sin., I, 198。”因此,杨福绵用德礼贤1938年的话作依据来批评德礼贤,是有失公允的^①。

关于《汉葡辞典》的下落,这是涉及到利玛窦研究的重大文献,在这里略作展开。在利玛窦研究中,至今仍有两部著作尚未发现,一个就是1598年他和郭居静等合作编撰的《汉葡辞典》,一个就是他所翻译的《四书》。

关于《汉葡辞典》,由于后失传,不知去向,中外学者都在寻找这部辞典。在西方最引人关注的说法是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所提的一部辞典。杨福绵在文中提到这件事,“这便是季尔赫尔(Athanasius Kircher,又名基歇尔)在1667年所提到的”,他说“我有一部为我们(耶稣会传教士)使用的汉语辞典手稿,如能获得印刷费,我很想把它付印成书”^②。1667年《中国图说》法文版出版时,书后附有一个法汉辞典,尽管没有一个汉字,但辞典采取的注音汉字方法,也可以达到对汉字的理解。因此,1667年《中国图说》出版后,关于这部辞典的来源和作者一直引起学者的探讨,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1667年《中国图说》后所附录的法汉辞典很可能就是利玛窦-罗明坚藏在耶稣会档案馆的《葡华辞典》,他说:“如此看来,《中国图说》法文译本中所载无汉字的辞典,说是利玛窦的这部辞典,亦有其可能”^③。

笔者认为,基歇尔看到罗明坚的这部辞典

可能性很小,他在罗马分别见过曾德昭、卜弥格、卫匡国、白乃心,但和罗明坚并未见过面。同时,利玛窦后来和郭居静合编的《汉葡辞典》带回欧洲的可能性也很小。关于《汉葡辞典》,柏应理(Philipus Couplet, 1624-1692)曾说,郭居静编过一部《按照欧洲拼音字母排序并按照声调分部的词汇表》(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利玛窦和郭居静编撰的《汉葡辞典》在哪里?杨福绵在文中说:“那就是费赖之(Louis Pfister, S.J., 1833-1891)的《入华耶稣会书士书目及列传》1934年法文增订版的卷末参考书中(996页)附了一条 Catalogue Ms de Pékin《北京手抄(耶稣会士人名)目录》。在该条脚注中谓这份目录是裴化行(Henri Bernard, S.J.)和范德(Fr. Van den Brandt, C.M.)两位神父在一部《汉葡字典》手稿附录里发现的。而这部字典是他二人于1933年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的。该手稿编号是22.658,共8+624+34页,32开本。字典未标明编著者姓名、成书年月及地址。费氏书增订人在括号里注有‘或许是1660-1661年间完成的。’^④这部辞典很可能是根据利玛窦等的《汉葡辞典》编成的。不过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查阅该稿本,并与《葡华辞典》的罗马拼音方案以及词汇作一番比较和考证的工作,才能得到结论。”^⑤

1987年金国平就注意到了这部辞典,他查阅后认为:国图藏汉葡辞典是供个人使用而编纂的,从葡文字迹以及中译葡的不确之处来看,作者的葡语水平高于汉语。至于此葡汉辞典的编纂年代,从辞典附录判断不早于1660年^⑥。

杨慧玲对这个辞典做了最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葡辞典手稿及其史料价值》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这部辞典的基本情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裴化行、费赖之等人所

① 杨福绵这样的批评在国内也有影响,徐文堪先生就认同杨福绵的观点:“德礼贤则认为,利氏所述的辞典即他发现的《葡汉辞典》。这显然不妥。”参见徐文堪:《谈早期西方传教士与辞典编撰》,《辞书研究》(上海),2009年第9期。

②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ol. II,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59,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1934, p.996. 参见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③ 伯希和(Paul Pelliot):《卜弥格传补正》,《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3卷,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3页。关于《中国图说》1667年法文版所附辞典的研究,参见马西尼:《对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释(1670年)》,《国际汉学》(北京)总第1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提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汉葡辞典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号已经变更为V/PL1459 P6C5。这部汉葡辞典手稿页宽7厘米左右,页长10厘米左右,是一部袖珍型辞典。现存页码有8页汉字部首表,624页单页辞典正文,24页附录,与费赖之1934年记载的34页附录相比,有10页的数差。费赖之等人并未对汉葡辞典的内容进行介绍。

国图善本汉葡辞典手稿按欧洲人习惯从左向右翻页,单页编排页码,内容完整,字迹整齐。汉字系中国人用毛笔书写,罗马注音及葡萄牙文释义系欧洲人用钢笔书写。

辞典正文前有一个322个汉字的部首表,右侧标出了在辞典正文中该部首汉字组的起始页码。正文中的汉字部首均用红色墨水书写,汉字均按剩余笔划数列于剩余笔划数数字之下,剩余笔划数也是红色墨水书写,非常醒目。部首表相当于初级检索表,正文醒目的红色部首和剩余笔划数对所收汉字进行了简单标注,起到了便利检索和查找使用的作用。

正文中每个词条都是注音、汉字词目、葡萄牙语对应词形式排列,释文部分没有任何汉字形式的例词。一个汉字常常对应多个注音。也有许多汉字词目下仅有注音而没有葡萄牙文释义。

国图汉葡辞典手稿附录的内容有:2页名帖格式,7页礼品名称数量名录,2页从1624至1683年欧洲纪年和中国甲子纪年对应的甲子纪年表(天干地支用金粉书写),4页书信套语,8页77名来华传教士名录,2页中国修士名录。

笔者发现,这份从1581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起至1660年入华的77名基督教传教士名录中,不全是耶稣会士。绝大多数耶稣会士名前都标注了“?”符号,多名我会传教士名字前有“D”,其余未标符号的人名部分是入华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传教士等。

辞典手稿最后一页有紫色“G.ROS”字样。封底内封上有用圆规绘制未完成的两个多层同心圆图形^[15]。

裴化行以降,学术界一直对中国国家图书

馆的这部辞典是否为利玛窦和郭居静所编制有一定的期待,杨慧玲是第一个对这部辞典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她的结论是:

从双语辞典史发展的角度推断,国图藏的汉葡辞典是以单一汉字为词目的辞典,肯定晚于罗马藏混合词目的手稿汉葡辞典。陈绪伦推测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辞典大约作于1625至1644年间^[1],笔者也发现虽然罗马藏汉葡辞典与利玛窦有一定的关系,但其完成时间在明末。结合国图藏汉葡辞典所附入华传教士名单,如卫匡国、南怀仁、潘国光、白乃心等一些著名耶稣会士名字前竟然没有标注耶稣会标志,所收最后一位入华传教士是1660年入华,而且没有中文名这样一些特征,可以推断:国图藏手稿汉葡辞典是由非耶稣会士编写的,约在1660-1661年间完成^[15]。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部辞典的归属,至少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这部辞典不是利玛窦和郭居静所编制的《汉葡辞典》,那么,利玛窦和郭居静所编制的《汉葡辞典》藏在何处?这仍是利玛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遗留问题。

四、《葡华辞典》中散页文献的语言学内容

首先,《葡华辞典》中散页文献在中国音韵学上有值得关注之处。先来看“宾客问答词意”,笔者认为其是西方汉语史上第一篇汉语对话教材,虽然全文没有一个汉字,汉字全部由罗马注音所代替,但这种形式却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汉语史上最早的罗马字注音汉字文献,显然这篇文献在时间上早于《葡华辞典》。《宾主问答辞义》第5a页有下面一段宾主对话:

Che iuo:si fu tau cie li yi chi nien liau
[k'əʔ yoʔ:sʔ fu tau tʃɛ li i ki niɛn liau]
客曰:师父到这里已几年了?

Ta iuo:zai yeu liā nien
[taʔ yoʔ:ts'ai iəu lian niɛn]
答曰:才有两年。

Che iuo:giu chin ni schiau te'mun cie piē
cuō cua po schiau te'
[k'əʔ yoʔ:ʒu kin ni xiau təʔ ŋo mun tʃɜ]

^[1] 陈绪伦(Albert Chan):《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举要》,M.E. Sharp,1998。陈绪伦认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编号 Japonica-Sinica IV 7 的汉葡辞典可能是耶稣会的费奇观或曾德昭的汉葡词典。

piɛn kuɔn xua poʔ xiau təʔ]

客曰: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

Ta iuo:ye schiau te'chi chiu

[taʔ yoʔ:iɛ xiau təʔ ki ky]

答曰:也晓得几句。

Che iuo:ye chian te.

[k'əʔ yoʔ:iɛ kian təʔ]

客曰:也讲得?

Ta iuo:lio schio kiā chi chiu

[taʔ yaʔ:lioʔ xioʔ kian ki ky]

答曰:略学讲几句。^[2]

日本学者古屋昭弘考察了文献中的注音特点,认同了杨福绵和德礼贤提出的观点,即在这一时期,罗明坚和利玛窦在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时,尚未注意到汉语语音发音中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所以这篇文献没有标注出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上述内容说明,“《问答》中的声调表示法虽然不完善,但可以说已具备了接受以后的五声符号的基础”^[16]。

同时,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对《问答》音系和《西儒耳目资》音系之间关系的考察,得出结论:“1584年罗明坚、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市编写的《问答》和金尼阁根据耶稣会在全国活动的需要,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这两份文献,音系上没有太大差异,在考虑到明代‘官话’的方言基础这点上,是很令人揣摩的。”^[16]这说明,关于这篇文献的注音系统和后来的《西儒耳目资》注音系统之间的关系仍待深入研究。

再看第24a—26b页上的汉字表,这个汉字表共有348个字,在前一时期的研究中,笔者尚未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字表,仅仅是从汉字识字的角度来谈的^[1]。杨福绵先生认为这个字表是表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的材料。他认为“表示声母的汉字339个,其中许多汉字表示同一个声母。表示韵母的汉字不超过39个。这个汉字表中的声母与韵母与《中原音韵》中的完全一样”^[19]。

散页中还有一些汉字和罗马字注音材料,

这些材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葡华辞典》的语音系统提供了参考。这里不做展开,笔者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这些散页中的语音材料是我们理解和打开《葡华辞典》语音系统奥秘的辅助文献,在学术上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其次,还须关注《葡华辞典》散页文献的词汇研究。第29页是一个双音节同义词表:声色,形影,儒道释,孟仲季,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分寸尺寸,飞潜动植,金木水火土,青黄赤白黑,安危笑哭。

第30v—31v页是双音节反义词表:表里,异同,迎送,远近,厚薄,授受,新旧,冷热,丰荒,饥饱,老少,寿夭,贫富,奢俭,贵贱,精粗,轻重,清浊,消长,盈虚,大小,男女,长短,浅深,肥瘦,难易,方圆,首尾,出入,开闭,天地,日月,风云,雷雨,霜雪。真伪,爱恶,是非,文武,强弱,生死,存忘,浮沉,动静,抑扬,俯仰,前后,左右,长幼,尊卑,众寡,聚散,贤愚,优劣,生孰,干湿,始终,早晚,昼夜,昏明,宾主,亲疏,巧拙,顺逆,用舍,吞吐,向悖,离合,买卖。阴阳,升降,寒暑,往来,上下,高低,内外,进退,香臭,甘苦,幽明,隐现,有无,虚实,得失,荣枯,盛衰,兴败,曲直,斜正,喜怒,哀乐,勤懒,逸劳,古今,治乱,急缓,宽窄,起倒,舒倦,钝利,美丑,横直,屈伸,善恶。

这些反映了罗明坚初学汉语时的实际情况,对我们掌握汉语习得的规律是有帮助的。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明坚关于量词的记载。量词是汉藏语系的独特语言现象,在中国古代语言中就已经存在量词,在甲骨文以及先秦文学中都已经存在。但被作为一个语法内容加以重视,则是西方语法体系传入中国以后。《马氏文通》作为研究中国古汉语的语法书,当时并未给量词命名,只是称之为“记数之别称”^[17]。直到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给量词一个明确的定义:“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之下,用来做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2]

传教士入华后按照西方语言来理解中国语法,卫匡国(Marinus Martini, 1614—1661)的

^[1] 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与《中西文化的初识:北京与罗马》中关于罗明坚汉语学习部分。

^[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由于认识的发展,现在主流语言学家已经放弃了将量词仅仅作为名词一个类别的作法,而主张量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

《中国文法》是传教士第一本中文语法书,在书中按照拉丁语法将中文分为八大词类: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叹词、连词、数词。他将量词放入“数词和数量值”之中,在他的的例句中包括了40个量词^{[18][19]}。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在他的《华语官话》中专列出“量词”,并举出了56个量词。

罗明坚在《葡华辞典》散页中是最早注意到汉语的量词问题的,由于这不是一本语法书,只是辞典的散页,所以他并未提出量词的概念,但他列举出了49个量词表。罗明坚这里的贡献在于:第一,他或许是最早注意到汉语中量词问题的西方来华传教士;第二,他第一次初步提出一个量词词表。因为卫匡国和万济国虽然是最早从语法上定义量词的,但都未将量词专门列出,而只是在例句中列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明坚的量词表在西方汉语史上是颇有价值的。

总之,《葡华辞典》作为来华耶稣会最有价值的早期文献,在学术上有着多重的价值,以往的研究都只集中在《葡华辞典》本身的研究,对其中所包含的散页几乎无人系统展开分析和研究,本文作一尝试提交给学术界,恳请学术界给予斧正。

参考文献:

- [1] JOSEPH ABRAHAM LEVI. O Dicionario Portugues - Chine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J., 1552 -1610, Una Abordagem Historico-Linguistica New Orleans: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 1998.
- [2] 杨福绵.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J]. 中国语言学报, 1995(5):35-81.
- [3] 杨福绵. 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 历史语言学导论[C]//魏若望(John W. Wittek). 葡华辞典,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 葡萄牙东方学会, 美国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

所, 2001:106.

- [4] 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M]. New York, London, 2002.
- [5] 赵继明, 伦贝.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J]. 文史哲(济南), 1998(4).
- [6]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 冯承钧,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7] 利玛窦全集: 第4卷[M]//利玛窦书信集: 下. 罗渔, 译. 台湾: 光启出版社, 1986.
- [8] 裴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 萧浚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9] 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e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i e commentati da Pasquale M. D'Elia[M].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I, Vol. 2:242.
- [10] 张西平.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J]. 历史研究, 2001(2).
- [11] 宋黎明. 一流的学者, 二流著作: 评夏伯嘉著作《紫禁城的耶稣会士: 利玛窦(1582-1610)》[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10).
- [12]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第三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3] 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 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336.
- [14] JIN GUOPING. Alguns dados sobre léxico chinês de origem portuguesa e lexicografia sino-portuguesa e vice-versa' [M]. Congresso sobre o Estado Actu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no Mundo, Actas Vol. II, Lisboa: Instituto de Língua e Cultura Portuguesa, 1987:364-379.
- [15] 杨慧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葡词典手稿及其史料价值[J]. 史学史研究, 2012(4).
- [16] 古屋昭弘: 《宾主问答释疑》の音系[C]//刘丽川, 译. 中国语学研究(开篇), 1988, 总第6.
- [17]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8] 卫匡国. 中国文法[M]. 白佐良,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9]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143.

(责任编辑 张耀南)

Abstract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e collected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ly historical fil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is paper publishes first the file sheets of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e, and then determines, based on these sheets, that the author should be primarily Michele Ruggleri instead of Matteo Ricci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e and Dicionario Chinese-Portugues, on which the academic world is discussing.

Key words Michele Ruggleri; Matteo Ricci;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e; sheets